



今日第一版

抗日烽火中的 民族日報

临安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
中共临安市委党史研究室
临安市政协文史和教文卫体委员会

中国文史出版社

抗日烽火中的



民族日報

临安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
中共临安市党史研究室
临安市政协文史和教文卫体委员会

主编 陈法生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抗日烽火中的《民族日报》陈法生 主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2.10 (古色今香丛书)

ISBN 978-7-5034-3868-7

I.抗… II.陈… III.文史综合作品集—中国—当代IV.1258.66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999989 号

书 名：抗日烽火中的《民族日报》

主 编：陈法生

出 版：中国文史出版社

发 行：中国文史出版社发行部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100081)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丛书策划：韩 军

出版监审：王春瑜

装帧设计：宁稼雨

责任编辑：殷 旭

图文策划：韩雨山

印 刷：杭州临安康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87×1090 1/16

印 张：17 印张 260 千字

印 数：0001-3000 册

版 次：2012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034-3868-7/I.989

定 价：2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请与承印厂调换)

《抗日烽火中的〈民族日报〉》编委会

编委会主任	陈法生
编委会副主任	张亚联 庄鸿章 郎宗月 章家衍 黄文根
主 编	陈法生
副 主 编	许茂华 王建华 陆全根
编 委	(按姓氏笔划为序) 方明祥 王玲萍 叶浩然 朱纫频 朱晓东 许宝文 杨菊三 陈文豪 陈晓生 巫振江 胡月耕 赵文忠 徐观德 郭军波 陶福贤 尉 进 章向明 谢小华
编 务	吴永玲

目 录

序	邵 毅/1
前言	编委会/3
《民族日报》资料图集	/19

《民族日报》创刊一周年文稿

本报创刊周年纪念	王闻识/57
一年来的工作经验	编辑部/60
关于采访工作	采访股/64
一年来业务概况	总务部/66
一年来的电讯工作	电讯股/68
我们是一群抗建的工人	印刷股同人/70
我们怎样在鹤村生活了一年	员工俱乐部理事会/72
一年前的故事	钱行素/75

《民族日报》记者往事回忆

《民族日报》碎忆	杨可扬/79
抗日前哨的一面旗帜	
——浙西《民族日报》始末	朱万年/83

时间短 得益多

——回忆我在《民族日报》的一段生活……………王 维/96

《民族日报》电讯室的后期斗争……………李 鹰/101

抗日大旗《民族日报》

——缅怀王闻识烈士创建领导《民族日报》的光辉业绩……翁 平/107

忆王闻识同志……………孙世镇/112

有关《民族日报》二三事……………张若达/116

抗日烽火中的《民族日报》……………乐培文/120

从幼稚走向成熟

——回忆在《民族日报》时的抗战经历……………邵克萍/149

三年学步

——关于战时《民族日报》的回忆……………张白怀/154

我主编《实生活》副刊的一点体会……………谢 狱/171

缅怀先烈 奋发向前

——忆抗战初期《民族日报》党组织活动片段……………朱万年/173

难忘天目山

——我与《民族日报》……………宋子亢/179

温馨的港湾

——在《民族日报》工作两年杂忆……………梁荻云/185

关于我在《民族日报》的一些回忆……………林国珽/189

记《民族日报》二三事……………陈文全/192

在敌特追捕下的日日夜夜……………许待琨/195

《民族日报》纪念文选

忆往昔

——重见 1938 年旧照……………骆耕漠/205

王闻识烈士传略……………翁植耘/208

记《民族日报》第二任社长曹天风……………卢贤松/214

抗战时期的《民族日报》	冯安琪/219
《民族日报》的两次改组	冯安琪/224
《民族日报》始末	陆全根/228
纵横千里访“老记” ——《民族日报》创刊 61 周年走访记	陆全根/237

附 录

革命先烈简介	249
《民族日报》部分人员简历	252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第六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和与现在省级文物 保护单位合并项目及更名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公告暨名单	256
民族日报社旧址和王闻识旧居	临安市文物馆/258
峥嵘岁月 历久弥新 ——民族日报社旧址保护与发展	临安市民族日报社纪念馆/260
为一种精神鼓与呼（代跋）	陈法生/264

序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本侵略军进犯浙江，杭嘉湖沦陷。1938年12月，国民党浙江省政府在临安市西天目山设置浙西行署，领导杭嘉湖地区的抗日战争。与此同时，共产党派遣了大批党员和爱国进步青年，利用各种关系打入浙西行署机关和文化团体，来到天目山区进行地下工作，并成立了中共浙西特委、中共於潜中心县委等组织，领导民众进行抗日救亡和革命斗争，使临安成为浙西抗战的中心。

1939年3月21日，周恩来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身份莅临西天目山，与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会晤，敦促其团结抗日，巩固抗日统一战线。24日，周恩来出席浙西临时中学开学典礼，向浙西行署全体军政人员、浙西临时中学全体师生发表了《敌我对比与抗日必胜》的演讲。周恩来的西天目山之行，对临安党组织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鼓舞，大大激发了临安民众的抗战热情。

1939年1月5日，《民族日报》在於潜鹤村创刊。该报名义上由浙西行署主办，实际上在早期是由共产党掌控，以地下党员和进步知识分子为骨干的进步报纸。在社长王闻识为首的中共民族日报社特别支部的领导下，报纸坚持抗敌，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坚持民主，反对独裁。以鲜明的政治立场，宣传党的持久抗战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

政策，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一些同志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民族日报》被誉为浙西抗战文化的一面旗帜。在血火交融的斗争环境中，《民族日报》培养、锻炼了一批杰出的新闻工作者。

《抗日烽火中的〈民族日报〉》一书，收录、整理了一批当年在民族日报社亲身战斗过的同志的回忆文章和图片资料，真实再现了当年艰难困苦的战斗岁月，为我们学习、了解民族日报社革命先驱的光辉事迹提供了鲜活的教材和第一手材料，也是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研究工作取得的重要成果。在此，我们谨向革命英烈和先辈们致敬！也向为此书付出辛勤劳动的同志表示感谢！

如今，民族日报社旧址已得到修葺保护，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和杭州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民族日报社革命先辈们崇高的爱国主义情怀、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继承先烈遗址，发扬英雄传统，创造美好生活，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和神圣职责。全市党员干部要进一步坚定共产主义信念，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体现先进性；广大人民群众要大力弘扬爱国主义、艰苦创业精神，热爱临安、建设临安；青少年学生要继承革命传统，胸怀大志，刻苦学习，努力成才。

让我们沿着革命先烈的足迹，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励精图治，奋发图强，为实现杭州西郊现代化生态市建设大跨越而努力奋斗！

中共临安市委书记

郑毅
2012年4月

前 言

《抗日烽火中的〈民族日报〉》，是七十年前，在天目山麓鹤村从事抗日救国宣传的老记者撰写的一本回忆录。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她）们辗转大江南北或异国他乡，可对《民族日报》的情愫没有因此而中断，那一颗颗赤诚之心，始终与这份张扬民族正气的报纸维系在一起。就象宋代词人张先在《千秋岁》一词中所写的“天不老，情难绝，心似双丝网，中有千千结……”

一张报纸，就是一部历史。换言之，《民族日报》也是临安市的历史。“爱国需要读史。”鲁迅先生说过；“历史上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何谓“灵魂”乎？——精神也。《民族日报》之所以有顽强的生命力和隽永的影响力，就在于它不屈不挠的抗日救国精神，就在于有勇有谋敢于粉碎敌伪文化攻势的决心。中国共产党就是靠这种百折不挠的精神，走上了民族复兴之路，走上了强国之路！

抗日战争是所有炎黄子孙在亡国灭种的危境中进行的一场惊心动魄、艰苦卓绝的民族自卫战争，优秀的华夏儿女不分地域、不分种族、不分政治信仰，同仇敌忾，支前抗日，保家卫国。有多少仁人志士为洗刷国耻，拯救民族于危亡，奉献出自己的生命，走上了不归路。这段在中国历史上血肉横流的历史，是中华民族屈辱史。在日本陷落的国耻日，获悉日本法

西斯侵占我国东北，挑起“甲午战争”，使旅顺口六万多条生命，顷刻间在辽东半岛消失了的屠城新闻时，义愤填膺。他走出日本监狱时，青锋一指——“时危挺剑入长安！……”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呐喊！

从“甲午战争”到“七·七”事变，时隔43年。1937年12月，日本法西斯在古都南京进行惨绝人寰大屠杀的同时，又用“东亚文化”来构筑侵略中国的“桥头堡”，企图以此摧垮中国人民的脊梁。锦绣江南，到处是尸横遍野，焦土满目，难民流离失所，中华民族到了亡国灭种的危险时候。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中共浙江地下党（临时）工委书记徐洁身、（临时）文委书记耕漠、第三游击支队政训室主任、兼《战时生活》杂志主编王闻识和著名文化人邵荃麟、葛琴等心里焦炙，想办报，没有钱，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黄绍竑二度主浙，制订了一份《浙江省战时政治纲领》，想通过《东南日报》广为宣传。谁也不曾想到，该报总编不领这个情，将它拒之门外，使这位堂堂一省主席面上无光。这件事，黄绍竑清醒地认识到，要想在浙江立足，必须要有自己的舆论工具，他由此想到要办报，这正好和浙江地下党的想法不谋而合。浙江地下党想办报，是有人无钱；省主席黄绍竑要办报是有钱无人。双方的有利与不利，正好可以互补有无，很快地达成了默契。

1938年11月，中共浙江地下党在临时省垣金华同升巷开了一个筹备会，措筹办报事宜。报纸命名为《民族日报》，开宗明义是“国家至上、民族至上，”跟敌伪文化作无情的思想斗争。筹备人员的大体分工是：徐洁身、章松寿采购印刷设备，王闻识组建班子与物色人才，杨嘉昌（可扬）则在孙中山遗墨中寻觅“民族日报”四字组合成报头。浙西行署和第一专署（於潜）也分别接到省政府指令，对报社的建立予以方便和支持。是年12月，一支以地下党员为核心的民族精英，在王闻识率领下，集结於潜鹤村。原定于翌年元月1日创刊的《民族日报》刚要上机时，获悉与鹤村隔溪相望的《浙西日报》亦于同日创刊，于是，王闻识社长和编委会临时决定，《民族日报》推迟到5号创刊。

以笔作刀枪，办报造“纸弹”，抗日救国难。

就在《民族日报》创刊不久的1939年3月下旬，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以军委会战地党政委员会委员的公开身份，由金华转道天目山，访晤浙江省主席黄绍竑，并应邀发表抗日演说，从中提到越王句践卧薪尝胆、生聚教训的民族复兴救国精神和明末戚继光将军抗击倭寇、收复失地的英雄壮举，给民族日报社新闻工作者以极大的震撼。中国人民力能扛鼎，也能摆脱屈辱的历史。

《民族日报》社也是中共浙西特委的活动点，以《民族日报》为掩护进行党的活动；而中共浙西特委宣传部长、兼中共於潜中心县委书记贺千秋，就是以《民族日报》特派记者的公开身份进出报社的。就在《民族日报》创刊半年后的7月，王闻识在贺千秋的帮助下，建立了中共民族日报社特别支部，社长王闻识兼任特支书记，编辑毕平非、唐石堤为特支委员。可想而知，《民族日报》全社员工，在那样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历经坎坷而不溃乱，都能在抗日救国的旗帜下凝聚人心，抗日寇，救国难，就是因为报社建有中共特别支部，起了关键性作用。《民族日报》在浙西抗日前线天目山，象熊熊燃烧的火炬，驱散了黑暗，点燃了光明。

莎士比亚说过：“一颗好心抵得过黄金。”社长王闻识就是有一颗金子般的心，突出地表现在他重视祖国的荣辱和民族的尊严，对人民军队的爱，甚于自己的生命。这年秋天，他只身千里赴皖南采访与日寇浴血奋战的新四军。很多同志劝他放弃这次采访活动时说：你不是关羽，这“千里走单骑”太危险了。王闻识说服了大家，祖国受欺凌，民族在蒙难，万千同胞被杀戮，大片国土被日寇践踏，我们能无动于衷吗？不！最危险的地方也要去。王闻识想问题与别人不同，他想得很远、很广、很细，往往人家容易疏忽的地方，他却想到了。就拿皖南之行来说，王闻识不只是单纯地采访，主要还是送西药到前方。在战争年代，盘尼西林（青霉素）在西药市场上奇缺得很，无论是新四军、八路军，还是国民党军队和侵华日寇都急需这类药品，所以保密工作

非常重要，要是泄露出去，就会被途中拦截。甚至连雇佣来挑药的小伙子，也不知道这“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也从不细问。在王闻识途经屯溪时，竟以“子龙”之胆独闯“曹营”，进了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的司令部，使得他在屯溪的好友为之捏了一把汗。众所周知，抗战初期，国共两党虽处于第二次合作时期，然国民党右派始终仇视中国共产党和她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从天目山麓到泾县云林，崇山峻岭，道路崎岖。王闻识不顾个人安危，克服了种种艰难险阻，到了新四军总部所在地云林陈家祠堂，采访了新四军代军长项英长达两个多小时，项英对抗日形势的精辟分析，缓慢有力而富有哲理的口才艺术，给王闻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40年3月，《民族日报》积极配合中共中央于2月1日在延安召开的反汪大会精神，从3月1日至31日，开展为期一个月的反汪肃奸宣传，报纸版面落满了反汪肃奸宣传的报道、社论及十日时评，使侵华日寇和汪伪汉奸如芒刺在背，坐立不安。是年下半年，国民党右派阴谋策划第二次反共高潮，溶共、限共、反共活动等卑劣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民族日报》也惨遭厄难，国民党特务一次又一次到报社印刷工场捣乱，报上“天窗”不断出现，报纸被扣压在浙苏皖桂等省的30多个通讯处不让外发，王闻识社长只好从中斡旋。浙西行署主任贺扬灵三番两次召王闻识谈话，威胁利诱，软硬兼施，要他改变报纸的立场。说穿了，就是要《民族日报》放弃民族大义，放弃抗日救国和反汪肃奸宣传的责任，去叫喊什么“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等陈词滥调，理所当然地遭到王闻识的严词拒绝。是年9月，国民党右派已迫不及待向《民族日报》开刀，但又感到心虚，怕激起民众的反对，不敢公开封闭报社，就用接管、改组、继续出版的方式来改变报纸的性质。

《民族日报》改组是王闻识意料中的事。就在贺扬灵处心积虑准备劫持《民族日报》前，王闻识的工作已做在前头了，委托国际版编辑崔晓立上天目山约见民族文化馆总干事乐培文，言告一旦“东窗事发”，王闻识社长要曹乐两先生出山主持《民族日

报》，使报纸不致落入国民党内投降势力手里，不然几年心血就会付诸东流，乐培文欣然允诺。《民族日报》改组后，各地进步组织都在关注《民族日报》的生存与发展，不断派遣中共地下党员与“民先队员”进入报社，以保持党员的有生力量。先后进入《民族日报》社的中共地下党员有沈逸民、沈光明、沈述儒（石如）、吴树人等；以后又有李鹤尧（李鹰）、谢狱、王维、邵克萍等“民先队员”，他们都先后在改组后的党组织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原《浙西导报》负责人吴梅（曼华），为逃避国民党桐乡当局抓捕，潜离桐乡屠甸到天目山，进《民族日报》担任编辑。她是一位“残疾斗士”，国民党桐乡当局的投降势力把吴梅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这样坚强不屈的共产党员进了《民族日报》，为地下党开展对敌斗争如虎添翼。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内的投降势力加紧策划限共、溶共、反共活动，白色恐怖笼罩天目山。贺扬灵为了控制《民族日报》，强行将报社从鹤村迁徙至天目山，以便他的控制。沈逸民、沈光明、李鹤尧、沈述儒、许待琨等地下党员和“民先队员”等进行抵制。浙西行署以“不拨经费”相要挟，正式下文于3月底迁徙社址。没过几天，天目山下附近发现一名日本军佐小宫山，企图潜入天目山。当地老百姓把他俘获了。在审讯过程中，《民族日报》记者郭一民、美术编辑邵克萍和日文翻译陆靖采访了审讯的全过程，写了一则报道，并附上一幅木刻画，刊登在《民族日报》上，使侵华日寇和汪伪汉奸极度恐慌。一计不成，又使出更为毒辣的一招，通过潜伏在天目山的汉奸特务，相互勾结，狼狈为奸，策划了一起“点火引鸡下蛋”的罪恶计划。4月15日12时许，正是天目山行署机关、学校、文化、新闻团体和寺庙和尚、香客就餐时间，突然禅源寺右侧的青龙山火焰升腾，紧接着是七八架侵华日军飞机呼啸而至，朝着火光目标进行狂轰滥炸，《民族日报》惨遭厄难，机件设备资料被褥衣服和八百四五十期归档旧报、近百幅版画全部被炸毁，报纸被迫停刊。“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江南名刹禅源寺被炸成一片废墟，成了国耻之地。社长曹天风去重庆受训，总编许焘去金华招聘人员，代总编

乐培文挑起了重建报社的任务，社址迁返原地鹤村，商借《浙西日报》印刷厂印报，版面压缩为四开四版，于6月1日复刊。报头下是一条通栏标题：“物质不灭，精神不灭，真理亦不灭。”报纸为此发表社论，题为“毁灭的信号，重建设的信号！”徐惠人、叶亮通过敌伪封锁线，赴外地采购到对开机、铜模、浇字炉等全部到位。不久，《民族日报》恢复对开大张。这时报社电讯室与十四无线电台合并，番号改为浙西行署无线电台总台第十六无线电台。

新任社长曹天风是一位富有正义感的国民党左派，为人正直，学识渊博，在天目山文化圈内有一言九鼎之威。早年在上海大学求学时，师从瞿秋白、李达，前者是中共早期领导人，后者曾是中共一大代表之一。1939年3月下旬，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由天目山转道绍兴寻根祭祖，那时曹天风还在绍兴担任《战旗》杂志主编，被绍兴各界推选为欢迎周副主席总代表，曹天风与周恩来从此结为挚友，两人互赠诗稿，一时传为美谈。在周恩来绍兴之行担任“向导”的宋子亢，是辛亥革命先驱、周恩来姑丈王子余“点将”的“绍兴通”，也是唯一担任采访周恩来绍兴之行的一名新闻记者。在周恩来副主席视察浙东抗日前线、寻根祭祖、瞻仰大禹陵等活动的珍贵照片，都是宋子亢拍摄的。那时，宋子亢是绍兴《民国日报》记者，因报道绍兴县政府邓县长“盗卖积谷”的新闻，邓县长大为恼火，将宋子亢驱逐出绍兴。正是街谈巷议邓县长“盗卖积谷”的丑闻时，《民族日报》代总编张若达也在绍兴，邀请宋子亢到《民族日报》共事，一定可以大展身手。宋子亢早年就读于上海民治新闻学校，受到新闻名家顾执中校长的赏识，而他的授课老师竟然是著名学者艾思奇、成仿吾、胡绳、钱俊瑞等，他们后来都去了延安。1957年至1959年，先后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辩证唯物主义纲要》一书，就是宋子亢的老师、中国共产党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在延安中央礼堂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课时的讲稿裒辑而成的。毛泽东主席对艾思奇非常尊重，每堂课必到场听讲，勤于笔记，还给艾思奇写过好多封信。在“十年动乱”中，艾思奇夫人把毛主席

给艾思奇的信件缝进棉衣里。党的十二大期间，这件事给胡耀邦总书记知道了，派人从艾思奇夫人那里取走，保存在中央党史研究室。宋子亢除汉语功底扎实外，又专修俄语、英语、日语，还独当一面采访了英王乔治六世的加冕典礼。说来也是巧合，周恩来绍兴之行，曹天风与宋子亢都被绍兴各界推选为欢迎周恩来回故乡寻根祭祖的“主角”；后来又都到了天目山，曹天风为《民族日报》改组后的新任社长，宋子亢则担任《民族日报》新闻编辑和采访部主任。

浙西行署主任贺扬灵以“杯酒释文权”的把戏，解除了社长王闻识的职务，但炽烈的抗日怒火依然在王闻识胸中燃烧。1941年3月6日，王闻识在金华谯楼巷5号寓所和地下党同志商谈设法营救“皖南事变”中失散的同志时，猝不及防，被突然闯进的宣铁吾保安团宪兵逮捕，在金华审讯了一个多月无有结果，后被押解到上饶集中营周田监狱关押，和冯雪峰、郭静唐、吴大琨、计惜英、叶玲（亦辛）和杨良赞六人囚禁在一起，他们都是社会上有声望的文化人，被难友尊称为“上饶集中营七君子”。尽管他们身陷囹圄，对王闻识来说，依然觉得天地开阔，经常变换与国民党特务的斗争手法，有时通过出墙报，以隐晦的比喻来嘲讽敌人，启发同志。宪兵特务最狠毒的一手，就是用超强度劳动来迫害那些“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化人。王闻识从不向敌人“哀求”，要他们大发“慈悲”来减轻劳动强度，总是默默的忍受着，以保持共产党人的人格尊严。冯雪峰是一位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文艺理论家，平时体弱多病，王闻识总是一个人干完两个人的劳动份额，帮助冯雪峰减轻“压力”。王闻识从不把国民党宪兵特务看成“铁板一块”，想方设法争取感化平时接触较多的看守人员，以启发说理来“融化”他们的铁石心肠，得到他们的帮助，以便和新四军干部、狱中党组织取得联系。

人们常说“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王闻识虽被囚禁集中营，依然信息灵通。隐蔽在国民党第三战区经济委员会的中共地下党员卜三同志到了上饶。王闻识获悉后，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通过一名宪兵送信给卜三，要他帮助筹足现钞五百元，作为

难友越狱后的经费，并告《浙江妇女》杂志主编林秋若也因禁狱中，生活艰辛，甚至连替换的衣裤都没有，云云。当时难友们竭力劝阻王闻识使不得，这太冒险了。其实，这时的王闻识早把自己的生死置之于度外。卜三接到信后被王闻识的精神感动了，立即设法筹集五百元现钞及衣服食品之类，交给宪兵分别转送给王闻识和林秋若同志。不久，赖少奇、邵宇两人越狱成功，其后“七君子”中的计惜英、叶玲、杨良瓚三人又在七人的共同策划下做成圈套，让宪兵特务上当越狱成功，用的都是这一笔钱。王闻识本有越狱的机会脱离魔窟，但为了照顾身患重病的冯雪峰，他把越狱机会放弃了。这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崇高品德，成了上饶集中营“无王即无冯”的一段佳话。

《民族日报》旗帜鲜明的抗日立场，不仅受到前方将士和沦陷区人民的欢迎，而且还受到国际同行的关注。1942年1月9日，美国合众社经理马广和记者李嗣百、墨特加等一行到天目山考察访问，与《民族日报》同行进行座谈，对我湘北大捷深感兴奋。在谈到上海沦为“孤岛”后，特别提到美国《密勒氏评论报》记者鲍威尔，因报道揭露日本侵略军在中国进行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已在上海失去行动自由云。中美新闻界同行还就进一步开展国际间反法西斯宣传报道等话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取得了一致的共识。

在中国新闻史上，《民族日报》是一张“身份”特殊的报纸，大致与1937年8月在上海创刊的《救亡日报》有些相似，明里是国民党的报纸，暗里是国共两党的产物，国民党出钱，共产党办报。所不同的是，《救亡日报》是周恩来同志授意，潘汉年同志具体策划操办，并由郭沫若同志任社长，夏衍为共产党一方总编辑，以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名义，同时也有国民党人参加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报纸。《民族日报》虽说也是由中共浙江地下党和进步文化人在临时省垣金华筹备，以省主席黄绍竑出面拨款支助的国民党报纸，然而从社长、正副总编到部主任全是中共地下党员，差不多有一年半多时间，国民党当局还是茫然无知，直到大张旗鼓地开展讨汪肃奸宣传，这才如梦初醒：报社有